

# 中印尼防疫合作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再建构

姜纪光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摘要】**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在印尼的国际形象，而两国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并没有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明显改善作用。随着2019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两国在防疫合作上的互动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传播和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印尼两国在防疫合作的互动中形成了认同，构建了两国“疫苗民族主义反对者”这一集体身份，这一集体身份促使印尼社会产生对中国防疫合作积极合作者的国际认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再建构。

**【关键词】**防疫合作；中印尼；国际形象

## 一、研究现状评述

1950年中印尼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的关系在跌宕起伏中发展。苏加诺时期，中印尼两国曾处于较为长期的蜜月期。然而苏哈托政府时期，中印尼两国断交关系长达二十多年，直至1990年才复交。之后，中印尼两国外交关系得到恢复与发展：2005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两国关系被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在同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与佐科政府提出的建立“世界海洋轴心”战略高度契合，中印尼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人文、旅游、教育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两国关系持续升温。现如今的中印尼关系也被认为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Siswanto, 2017）。

中印尼双边关系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着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在印尼的国际形象的不断发展变化。韩冬临（2017）通过对2005年到2013年十年间印尼公众对中国形象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良好、和睦的中印尼双边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指出个人的教育水平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存在正面关系。杨菲菲（2018）以共生理论为依据，得出中国与印尼之间经贸合作存在着共生关系，并且双方已经具备了向一体化共生、以及对称互惠共生进化的基础与条件，进一步发现中印尼贸易一体化对于印尼的利好大于对中国的利好的结论。潘玥（2018）从策论的视角指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如战略对接欠具体、渠道不畅通、纳土纳问题成海洋合作主要障碍等。骆永昆（2019）指出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提出使得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冲突面逐渐上升，但同时与“一带一路”倡议又有较多契合之处，两国在海洋问题上也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吴崇伯、张媛（2019）指出，尽管“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印尼合作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但通过与佐科政府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实践，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新思路。徐理群（2020）以经济学为视角，得出疫情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带来机遇。韩冬临（2017）专门指出，中国和印尼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并没有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明显改善作用。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提

升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并非通过贸易和投资就可以直接提升中国在对方国家的国家形象。

与经济上的互动所不同的是，面对2019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在抗疫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双方不仅达成了多边的“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倡议”，签署了支持东盟实现疫苗安全和自主保障的《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来加强新冠疫苗等公共卫生合作。中国政府也多次表态，支持印尼建成区域疫苗生产中心，以“疫苗外交”为代表的中印尼之间的抗疫互动，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印尼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而且广泛地影响着印尼普通百姓对中国的印象。

以上所述得出，中印尼之间的经贸互动为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中国在印尼的国际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相应地提升。而中印尼两国在防疫合作上的互动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传播和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对建构主义视角对中国国际形象再建构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验证及创新；在应用上，可以为决策者制定后疫情时代对印尼政策提供新的视角。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1. 文献综述

国家形象研究中存在不同的争论，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解读。建构主义范式认为国际关系是由历史和社会决定的，而非人性或其他政治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强调文化和认同的重要性。围绕中国国际形象建构，通过对中印尼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印尼的国际形象的梳理，得出印尼和中国“政冷经热”“民冷官热”这一现状。在这一现状基础上，针对印尼和中国在抗击2019新冠疫情上的合作互动为切入点，以中国国际形象的再构成为研究对象，提出本课题的研究问题。

### 2. 资料搜集

首先从现有的文献数据库、中印尼两国官方媒体、政府官网等等渠道搜集印尼政府及民间为抗击2019新冠疫情所进行的双边及多边互动的事实，在大量资料搜集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归纳。其次根据整理归纳出

来的互动事实得出双方互动而产生的共有知识,根据双方互动事实所产生的共有知识梳理出对中国和印尼身份的建构作用,得出印尼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同,从而实现中国国际形象的再建构。

### 3.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

从现有的文献数据库,归纳、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厘清印尼的中国国际形象现状及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的发展脉络,重新建构理论分析框架。从多角度对中国同印尼在各个领域合作互动的相关研究文献作比较分析,借鉴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国际形象的传播与建构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塑造本课题研究的学术合法性。

#### (2)案例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和印尼官方及民间的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事实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印尼在抗疫合作中对“共同观念”的构建,及其对双方集体身份的构建,尤其是中国身份的认同,从建构主义视角揭示两国在抗击新冠疫情合作对中国国家形象在建构的行动逻辑及内在机理。

### 4.理论框架

面对2019新冠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印尼双方进行了合作互动,并产生了共有知识。本课题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行为者身份这一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研究中印尼抗疫合作互动如何实现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再建构。Alexander Wendt(1999:224)指出,集体身份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吴瑛,史磊等(2021)指出国家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主客体的互动建构中实现的。国家身份既需要一个国家的自我定位,也需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际形象就是国际认同的一种反映。

### 5.主要内容

#### (1)中印尼关系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回顾及现状

印度尼西亚建国以后,借由同中国建交寻求临近大国道义上的支持,于1950年4月13日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受华侨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美国因素的影响,直到1953年印尼才正式任命驻华大使。这一阶段印尼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是由于寻求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同时对华怀有猜疑和戒备。直到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召开期间,两国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印尼关系才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相继签订了友好条约和文化协定,实现了两国的直航,签订了经济、技术和贷款合作协定。这十年中,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印尼政府放下对中国的猜忌和怀疑,同中国开展了密切接触,但民间对中国的担忧和防备一直存在。直到1965年印尼“9·30”事件以后,苏哈托政府开始实施反共排华方案,采取了全面倒向西方的战略,直接导致了两国在1967年断交。直到1990年两国复交前的23年中,两国关系不仅全面倒退,并直接导致了印尼国内对中国和共产党的

仇恨和敌视。该阶段印尼官方和民间对中国的印象降至历史最低点,中国在印尼的国家形象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并影响至今。1990年两国复交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这期间,两国逐步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主要局限于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方面,未达到政治互信和全面友好程度,印尼对中国持不信任和猜疑的态度一直存在。1998年苏哈托独裁政府下台后,印尼进入了民主改革时期,中印尼两国关系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两国经济和人文交流得到全面恢复(蔡金城,2012)。2005年两国元首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双方启动副总理级对话机制,双方的交往从经济、人文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2013年,两国关系被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在同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与佐科政府提出的建立“世界海洋轴心”战略的高度契合,中印尼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人文、旅游、教育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两国关系持续升温。现如今的中印尼关系也被认为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Siswanto,2017)。

韩冬临(2017)通过对2005年到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印尼公众对中国印象的结论:从总体上看,印尼公众对中国印象较佳。而且,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对中国的好感基本稳定,且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而浮动。良好、和睦的双边关系有助于培养公众对中国的好感,而矛盾与冲突则会产生负面情绪。此外,韩冬临(2017)专门指出,中国和印尼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并没有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明显改善作用。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并非通过贸易和投资就可以直接提升中国在对方国家的国家形象。

#### (2)抗议合作互动对双方身份的建构

2019新冠疫情于在中国爆发之初,受西方媒体及印尼民粹主义的影响,印尼政府派军机迎接在武汉留学印尼学生回国,并中断了中国直达印尼的航班,这直接引起了中国的不满。2020年年中,随着印尼本土疫情的爆发,印尼主动同中国开展了抗议合作,不仅积极从中国寻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抗疫物资,并成为了第一批接收中国疫苗的国家。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抗疫物资和疫苗的研发和生产的产能的需求急剧暴增。基于印尼疫情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印尼双方在抗疫合作中的互动,印尼和中国逐渐达成了共识:发达国家囤积疫苗,囤积抗疫物资,这加剧了欠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双方开始共同呼吁抵制“疫苗鸿沟”,在抗疫上的共识构建了双方“疫苗民族主义”反对者的集体身份。印尼不仅寻求获取更多的抗疫物资,并在中国的支持下,寻求成为区域疫苗生产中心。而中国为抵制“疫苗鸿沟”,寻求成为全球抗疫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帮助印尼建设成为区域疫苗生产中心。

#### (3)集体身份的认同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

集体身份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自我被“归入”他者(Alexander

Wendt, 1999: 224)。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认为, 国际体系中一国之形象包含了本国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形象认知。这构成国际形象建构的第一重理论逻辑, 即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及其分殊(唐磊, 2021)。在中国同印尼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互动中, 达成了抵制“疫苗鸿沟”的共识。该共识构建了中国和印尼成为“疫苗民族主义”反对者这一集体身份, 在这一集体身份的互动中, 印尼与中国自我和他者的彼此界限变得模糊, 使得双方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了对他者的认同。吴瑛、史磊等(2021)指出国家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在主客体的互动建构中实现的。国家身份既需要一个国家的自我定位, 也需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国际形象就是国际认同的一种反映。在两国在抗疫合作互动中, 印尼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即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一种反映。并且, 不同于经济和人文交流的受众范围的限制, 新冠疫情事关每一位社会参与者, 印尼普通老百姓都能通过以疫苗口罩为代表的抗疫物资直观、立体地感受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使印尼普通老百姓都参与到对中国在印尼的国际形象的建构中来, 其深度和广度都是传统的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所不能企及的。

#### 6. 结论与建议

中印尼两国在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经济合作上的成功, 给印尼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提升印尼对华认知度的同时也伴随着印尼社会对华的消极印象。而面对 2019 新冠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中印尼两国在抗疫合作的互动中形成了认同, 构建了两国“疫苗民族主义”反对者这一集体身份, 这一集体身份促使印尼社会上至印尼政府, 下至普通百姓对中国的国际认同, 从而实现了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再建构。

中国与包括印尼在内各国的抗疫合作是中国国际形象再建构的重要抓手, 然而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合作不可能止步于此, 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也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在后疫情时代, 充分展示中国抗疫积极合作者的形象, 把握历史机遇, 继续促进中国国际形象的传播, 促进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具体建议如下:

(1) 将国际形象内化于行动表现和观念转换中: 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国家形象在印尼乃至东南亚的传播, 在理解尊重当地风土人情的基础上, 坚持以诚待人的道德传统, 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培育专业的传播人才, 变官方的单向外宣为民间的双向互动。

(2) 培养驻外企业的国际传播意识和能力: 加强中企公民身份意识, 发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传播价值, 提升中国员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传播内容上, 诉诸共通情感增强价值传播; 重视跨文化差异, 增强对印尼本土文化语境的认知和理解, 加强本地化和国际化表达。

(3) 增强侨民及双方留学生的传播主体地位: 留学生群体对于一个国家形象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中印尼双方留学生规模日益扩大, 要强化中国留学生的公民身份意识,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讲好中国故事;

扩大双方人文交流, 提供更多的留学信息和机会。

(4) 探索更多样的国际形象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通畅国际传播的媒介渠道; 拓展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多种传播方式; 以经济合作为基点, 以抗疫合作为抓手, 加强中国的制度及文化的浸润能力建设, 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模式。

#### 三、预期价值:

本课题最主要创新之处是以中印尼抗疫合作互动为切入点, 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在印尼的国际形象再建构进行跨学科研究。在理论上, 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验证及创新; 在应用上, 可以为决策者制定后疫情时代对印尼政策提供新的视角。

#### 参考文献:

- [1] 蔡金城. 印度尼西亚社会与文化及投资环境[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 [2] 韩冬临. 印尼公众的中国形象: 现状、变化与来源[J], 《战略决策研究》, 2017.02
  - [3] 骆永昆. “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背景下印尼在南海的利益探析——兼议中印尼合作的机遇与挑战[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 [4] 潘玥.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合作: 成果、问题与对策[J], 《战略决策研究》, 2018
  - [5] 唐磊. 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的理论与策略[J], 《人民论坛》, 2021.11
  - [6] 吴崇伯 张媛. “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新时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进展及前景透视[J], 《厦门大学学报》, 2019
  - [7] 吴瑛, 史磊, 阮光册. 国家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分析与反思[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21.08
  - [8] 徐理群.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东盟合作[J], 《南亚东南亚》, 2020.06
  - [9] 杨菲菲. 共生理论视角下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研究[D], 天津财经大学, 2018
  - [1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1] Siswanto. Politik Luar Negeri Indonesia terhadap Tiongkok: Memperjuangkan Kepentingan Nasional Di Tengah Ketidakseimbangan Kekuatan[J]. Jurnal Penelitian Politik. No. 1: 2017.
- 作者简介: 姜纪光, 1993 年, 男, 汉族, 河南省禹州人, 硕士研究生,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助教职称, 印度尼西亚语言与国别。
- 基金项目: 本课题系“2021 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N2021056)